



BAILIANG WENCONG
百家廊文丛

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

以敦煌壁画为中心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in Chinese Art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
A Study Based on Dunhuang Murals

张建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支持

BAIJIALANG WENCONG
百家廊文丛



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

以敦煌壁画为中心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in Chinese Art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y
A Study Based on Dunhuang Murals

张建宇◎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以敦煌壁画为中心 / 张建宇著.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9

（百家廊文丛）

ISBN 978-7-300-25314-5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敦煌壁画—研究 IV. ①K87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255号

百家廊文丛

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

——以敦煌壁画为中心

张建宇 著

Han-Tang Meishu Kongjian Biaoxian Yanji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开本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张 27.5 插页2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02 000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靳 诺 刘 伟

编委会副主任 贺耀敏 刘元春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拼音排序）

冯惠玲 冯仕政 胡百精 刘大椿

孙 郁 王 轶 严金明 乌云毕力格

张 杰 张雷声

序 言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从1937年到2017年，从延安的陕北公学，到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正定的华北大学，再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历史沧桑，斗转星移，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八十年来，几代学人进行了殚精竭虑的学术探索，在治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发扬老一辈学者的笃实学风，同时借鉴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有力推动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内学科门类建设齐全，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呈现出人才辈出、欣欣向荣的学术繁荣景象。

201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中国史、统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14个一级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入选学科除统计学为理学学科外，其余全部为人文社会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14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国人

民大学八十年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是鼓励和认可，更是鞭策和期许。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如果我们将“双一流”的人选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展新的征程的信号，那么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坐标点上。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更需要开拓未来。

2016年中，学校科研处的同志与我们谈起，他们准备在校庆年启动一项名为“百家廊文丛”的持续支持工程，希望通过多年连续性的资助，把学校各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所撰写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择优出版，系统性地展示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整体学术水平。科研处作为管理和服务教师科学研究的机构，一直把提升科研品质、打造学术精品作为部门的责任。但是，客观地讲，中国高校的文科科研经费投入还是有限的，怎样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出成效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多年来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科研处也做了许多有益的谋划，推动了学校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校庆年首度推出“百家廊文丛”，具有几层特殊的意义。首先，“百家廊文丛”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厚学术实力。入选的多部著作各具特色，有的资料翔实，有的论述细密，有的条理畅达，有的富有文采，足以彰显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学术实绩。其次，体现出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群体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沉人文情怀。有的学者耐得住寂寞，苦坐书斋；有的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寻一手数据。再次，丛书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与国内外的学者之间架起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百家廊文丛”如能持续坚持下去，就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值得期待。

大学因学术而显厚重，因学者而富气象。“百家廊文丛”首批推出的著作，选题丰富多元，特别是对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对于“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的强调和看重，一直以来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百家廊文丛”如果能做到叫得响、

传得开、留得住，就成功了。好的学术成果一定要能沉淀下来，而非过眼云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中国人民大学长期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优良传统，始终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不论是在抗战烽火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不论是遭受了“文革”的磨难，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凤凰涅槃，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一方面坚守书斋、甘于清贫，另一方面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的命运从来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从来志向远大，他们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我们推出这套文丛，正是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文脉，弘扬砥砺奋进、实事求是精神的有益之举。

“百家廊文丛”的名字，非常契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因为“百家廊”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著名风景，在李东东同志创作的《人民大学赋》中有云：“百家廊，檐飞七曜，柱立八荒，凝古今正气，汇中外学术。”我们认为，这几句话就是对即将面世的首批“百家廊文丛”的最好诠释。“百家廊中百家争鸣”，这套文丛是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校庆的一份心意，祝愿这所伟大的学校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往开来、再续辉煌。

是为序。

靳诺 刘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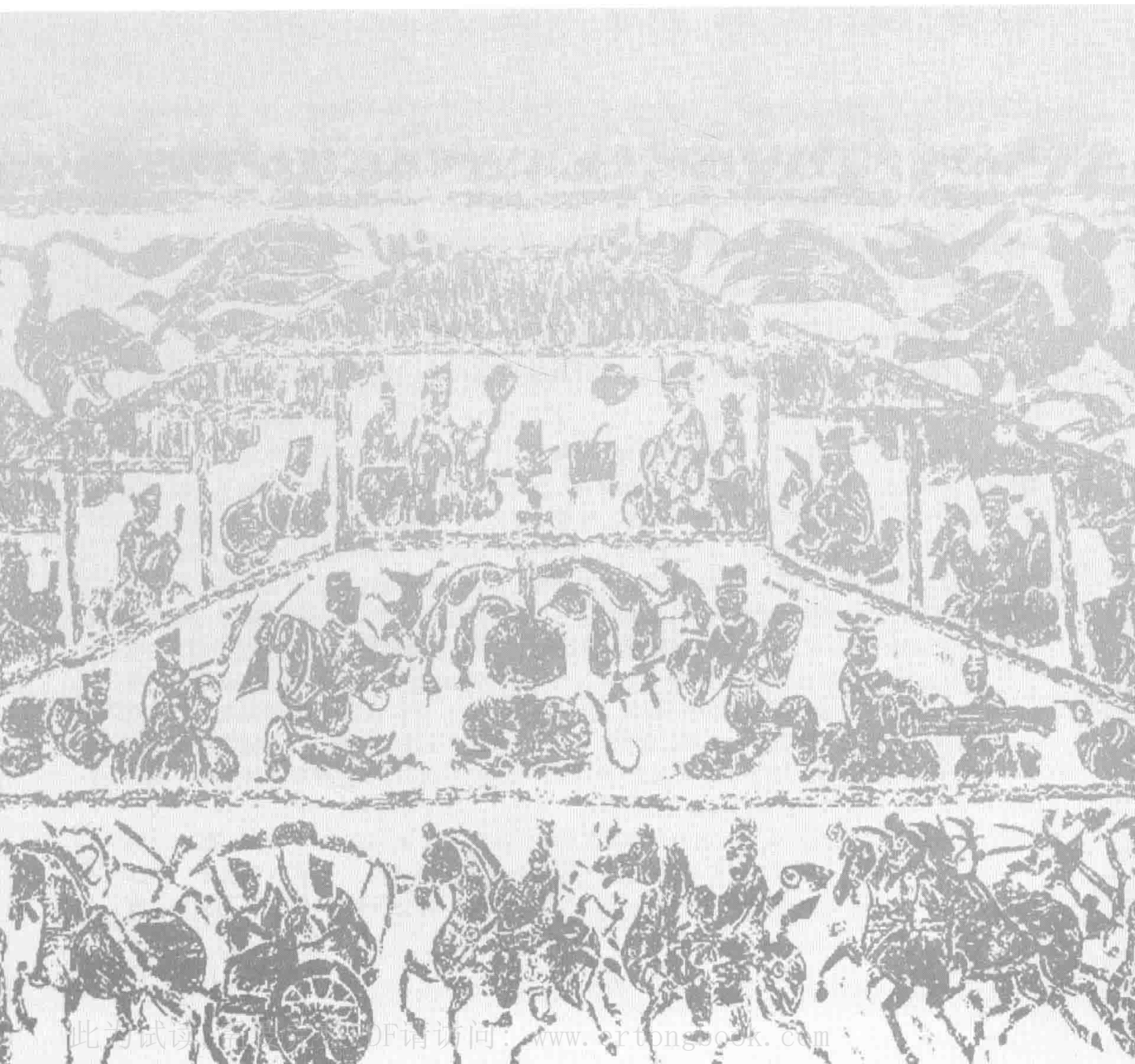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敦煌艺术研究史回顾	3
一、起步阶段（1900—1940）	4
二、展开阶段（1940—1976）	7
三、深入阶段（1976 年至今）	10
第二节 方法与问题	18
一、“分界”和“关联”	18
二、方法论检讨	19
三、空间表现问题	26
第一章 前敦煌艺术	31
第一节 引言：风格辨识的意义	33
第二节 早期艺术的视觉结构	35
一、母题形式：物象之本	35
二、物象组合：平面叠加	39
三、场景表现：混合视角	43
第三节 东周秦汉：三维再现初现	46
一、空间再现之始	46
二、两种画法的并存	51

三、斜边形空间画法	55
四、新画法之流行	61
第四节 问题辨析：关于汉画新风	79
一、新画法之定名	79
二、汉画之视觉语法	81
三、新画法的文化属性	85
第二章 敦煌早期壁画	87
第一节 “早期三窟”壁画	89
一、“早期三窟”的难题	90
二、第 272 窟	94
三、第 275 窟	101
第二节 北魏壁画	108
一、北魏 254 窟	109
二、北魏 257 窟	117
第三节 再议早期洞窟的年代关系	126
第三章 北朝晚期壁画	129
第一节 中原艺术复兴	131
一、平城时期	132
二、洛阳时期	140
第二节 敦煌西魏壁画	171
一、传向河西	171
二、西魏 249 窟	178
三、西魏 285 窟	184
第三节 敦煌北周壁画	204
一、发现北周洞窟	204
二、北周 428 窟	205
三、北周 290、296 窟	214
四、北朝晚期的工匠问题	224
第四节 问题辨析：省思六世纪风格之变	229
一、风格之变：母题还是结构？	229
二、风格之变：线性还是事件？	230

三、风格之变：复兴还是革命？	234
第四章 隋代至盛唐壁画	253
第一节 引言	255
第二节 经变画之视像构成	257
一、经变画及其分类	257
二、净土变图像来源诸说	260
三、从汉画到佛教图像	271
四、敦煌隋唐经变画	284
五、问题辨析：定名、分类与描述用语	316
第三节 敦煌壁画中的“山水之变”	323
一、小引	323
二、母题画法：“若可斟酌”	324
三、空间效果：“咫尺重深”	337
第五章 远近法与透视术	355
第一节 术语与观念	357
一、小引	357
二、中国古代术语：“远近”	357
三、观念：“尤讲远近”	359
第二节 斜边形图式	363
第三节 矫正	370
一、近大远小	370
二、墨色浓淡	372
三、详略有别	375
第四节 余论	379
图版目录及来源	382
主要参考文献	410
索引	423
后记	427

绪 论



第一节 敦煌艺术研究史回顾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约1849—1931)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储藏大量中古写本和艺术遗珍的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藏经洞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①,从而开启了被陈寅恪(1890—1969)称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Dunhuang Studies)^②,同时这一事件也拉开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序幕。

至20世纪末,敦煌学早已发展成为国际学林中的一门显学。敦煌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史料来源是敦煌文书和敦煌艺术,二者关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百余年间,敦煌艺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方雅之作亦难胜数^③。从学术史角度,约可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是起步阶段,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尚未展开系统研究,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多由欧美和日本学者完成。从194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敦煌艺术研究全面展开,特别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成立,体现出中国学者的担当,这一良好势头一直延续到1966年前后,此为第二阶段。

① 所谓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西陲木简、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王国维(1877—1927)首先提出的,后来前三大发现各自发展出独立的学科,即甲骨学、简牍学(简帛学)和敦煌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该文是1925年暑期(约7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演讲稿。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傅杰.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07-211.

②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66.

③ 台湾学者郑阿财、朱凤玉主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和《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98—2005)》(台北:乐学书局,2006)共收录1908年至2005年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收入“艺术”部分的论文或著述共计2671篇,其中1908—1997年1712篇,1998—2005年959篇。“艺术”部分所收录的论著还包括“音乐”、“舞蹈”及“相关石窟”(敦煌以外石窟),篇目相对较少,此外部分论著有重复收录现象,譬如某些日文论著可能将日文版本和中译本算为两篇,或者研讨会论文又在期刊上发表等。

1970年代末敦煌学再次步入正轨,1980年代兴起了“敦煌热”,乃至“丝绸之路热”,学界同欧美、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敦煌艺术成为跨学科、跨国界的经典研究领域。

在回顾学术史之前,先就研究综述所论及的范围做两点说明。其一,敦煌艺术包括石窟建筑、雕塑、壁画、藏经洞艺术品和(敦煌文书)书法几大方面,其中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整体,它是敦煌艺术的主体,被称为“敦煌石窟艺术”。下文所论述的学术史脉络,主要围绕着石窟艺术研究展开,藏经洞遗画和敦煌书法暂不涉及。其二,从学科划分角度,敦煌艺术研究主要属于考古学(archaeology)和艺术史(art history)范畴,此外还涉及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为了避免牵扯过远,以下学术史回顾主要选取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起步阶段(1900—1940)

(一) 欧美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在其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来到敦煌,他以极低的价格从王圆箴处骗购到大量经卷文书以及绢画等艺术品536件,其中282件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254件收藏于印度的新德里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①。

翌年2月,正在新疆考察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在得知藏经洞之事后,旋即奔赴敦煌,又劫去经卷文物数千卷。在敦煌期间,伯希和还与摄影师努埃特(Charles Nouette, 1869—1910)、测绘师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

① 斯坦因论及敦煌石窟的著作主要有: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Oxford, 1921).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n the Westernmost Border of China*. London, 1921);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 China*. London, 1932). 向达,译.上海:中华书局,1936。其中《西域考古图记》(另译作《塞林底亚》)附件五标题为《论敦煌千佛洞佛教绘画》(*Essays on the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Caves from Cave of the Thousand Buddhas*),包括拉斐尔·皮特鲁西(Raphael Petrucci, 1871—1917)和罗伯特·劳伦斯·宾雍(Robert Laurence Binyon, 1869—1943)的四篇文章。《西域考古图记》与同年出版的斯坦因《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是关于敦煌艺术最早的著述。

1876—1963)等人首次对莫高窟进行了系统考察,开展包括编排洞窟号(共编窟182号)、绘制窟形草图、记录壁画内容和题记等科学性工作,此外他们还拍摄了大量壁画照片,于1920年至1924年陆续出版了6卷本的《敦煌石窟图录》^①,公布近400张照片。这是最早的敦煌莫高窟图录,影响深远,早期敦煌艺术研究者多依据此书。

1914年8月,奥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带领俄国西域考察队来到敦煌,对莫高窟开展了全面而细致的综合性考察,他们逐窟测绘、记录,对重点洞窟进行临摹,并拍摄照片2000余张,他们的考察工作一直持续到1915年1月。遗憾的是,奥登堡考察队的成果长期被束之高阁,未能整理、出版,现分藏在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直到2000年至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第3至6册时,才陆续公布869张黑白照片、洞窟测绘图及考察笔记^②。

1923年至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也来到敦煌,他盗走第328窟一尊唐代供养菩萨塑像,并揭取十余幅唐代壁画。尔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的罗瑟福·盖特斯(R. J. Gettens)博士对这些壁画和彩塑上的颜料做了化学分析,并于1935年底写出关于中国古代颜料问题的实验报告^③。华尔纳后来撰写的《佛教壁画:九世纪万佛峡洞窟研究》(1938)是一本较早的敦煌艺术学术著作,该书讨论了被他编为万佛峡第5窟(今榆林窟第25窟)的壁画题材、绘画技法及所用颜料等问题^④。

(二) 中国

敦煌文物遭劫掠后,中国学者才开始意识到藏经洞遗珍的巨大价值。

194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侧重于敦煌文书研究,知名敦煌学者诸如罗振玉

① 全名是《敦煌石窟图录:魏、唐、宋代的佛教绘画与雕塑》(*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peintures et sculptures bouddhiques des époques des Wei, des T'ang et des Song*. Paris, 1920-1924)。此外,伯希和还做了现场笔记,现已整理并有汉译本刊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Paris, 1980-1992)。耿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时至今日,由于自然和人为破坏,部分壁画和题记已残毁,抑或不复辨认,当年伯希和抄录的题记以及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愈显得弥足珍贵。

②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艺术品》:第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005。

③ 盖特斯. 中国颜料的初步研究. 江致勤,王进玉,译. 敦煌研究,1987(1): 98-103。

④ Langdon Warner. *Buddhist Wall-Painting: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Fo-Hsia near Tun-hua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1866—1940)、王国维、陈垣(1880—1971)、陈寅恪、胡适(1891—1962)等人,对敦煌文书开展了经籍、史地、宗教、文学以及中亚语言等方面的研究,相比之下对敦煌艺术则关注较少^①。

1925年,华尔纳第二次来华,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推荐,北京大学医学院的陈万里(1892—1969)得以随队考察敦煌,陈万里所著的《西行日记》(1926)^②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察记录。

此外贺昌群(1903—1973)于1931年发表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③一文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艺术最早的专论,贺昌群的研究主要以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所发表的照片和记录为依据,并辅助以敦煌文书及其他文献史料。值得称道的是,贺昌群充分注意到敦煌石窟背后的文化渊源,力求在北传佛教系统的宏观背景下勾勒出敦煌石窟的特色。

(三) 日本

大谷探险队带回敦煌文物后,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浓厚兴趣。不久后西方探险者公布敦煌石窟和藏经洞艺术品的图像资料,为敦煌艺术研究创造了条件。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教授泷精一(1873—1945)及其弟子松本荣一(1900—1981)成为日本敦煌艺术研究的主要开创者。

早在1920年代,松本荣一便开始在日本的《国华》月刊上发表佛教艺术文章,他的代表性著作《燉煌畫の研究》(1937)^④堪称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被日本学者誉为“当时敦煌佛教美术研究领域的金字塔”^⑤。松本氏根据英国、印度、法国和日本所藏的藏经洞绘画,以及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公布的敦煌壁画资料,主要运用图像学方法,深入考证了敦煌绘画的图像内容及其经典根据,并将敦煌绘本与印度、西

① 关于中国早期敦煌学的情况,详阅:傅芸子. 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 中央亚细亚, 1943, 2(4); 收入: 冯志文, 杨际平. 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 综述卷(一).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182-190.

② 陈万里. 西行日记. 北平: 朴社出版社, 1926;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点校再版), 2002.

③ 贺昌群. 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 东方杂志, 1931, 28(17); 收入: 林保尧, 关友惠. 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 艺术卷(一).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20-43. 贺昌群另著有: 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 燕京学报, 1932, 12.

④ 松本荣一. 燉煌畫の研究. 东京: 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 1937; 东京: 岩波书店, 1980; 东京: 同朋舍, 1985. 泷精一和松本荣一的著作目录, 详见: 陈民. 松本荣一先生与敦煌学研究. 敦煌研究, 2000(3): 183-185; 陆庆夫, 王冀青. 中外敦煌学家评传.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155-172.

⑤ 百桥明穗. 敦煌学百年间美术史研究的轨迹// 敦煌研究院. 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下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646.

域和日本的佛教艺术进行横向比较。该书可谓敦煌艺术图像学研究的定鼎之作，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展开阶段（1940—1976）

（一）中国

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界对敦煌石窟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张大千（1899—1983）、王子云（1897—1990）、史岩（1904—1994）、向达（1900—1966）、夏鼐（1910—1985）、阎文儒（1912—1994）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或画家先后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踏查，他们不仅进行诸如著录石窟内容、考证建窟年代等工作，张大千等先生还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

1942年和1944年，以向达为首的两次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西行敦煌实地调查，考察团的规模和所取得的成果远超过1920年代陈万里的调查。1996年方得以出版的石璋如（1902—2004）三卷本《莫高窟形》就是“西北史地考察团”最重要的考察成果之一，此书逐窟记录了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尺寸和内容，并附有每个洞窟的平面图以及437幅黑白照片，是莫高窟最早的系统测绘资料^①。此外何正璜（1914—1994）《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943）^②和史岩《敦煌千佛洞现状概述》（1943）^③也完成于这一阶段，它们是最早的“敦煌石窟内容总目”。

1942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1944年2月，隶属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1904—1994）出任所长。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人力调查洞窟，史岩受委托负责调查并抄录洞窟题记。1947年印行的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④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

1943年，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的罗寄梅（罗吉眉 / James Lo, 1902—1987）偕夫人刘先来到敦煌，他们应常书鸿之邀，于1943年至1944年间，在莫高窟、榆林窟精心拍摄了2000余张照片。后来“罗氏档案”为美国和日本的敦煌艺术研究提

① 石璋如. 莫高窟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

② 何正璜. 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 说文月刊，1943，3（10）.

③ 史岩. 敦煌千佛洞现状概述. 社会教育季刊，1943，1（2）.

④ 史岩.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上下册. 比较文化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